目　　录

序……余金堂（1）

武汉抗战概述……皮明麻（3）

抗战初期党在武汉领导的革命斗争

……李　泽　郑自来　萧志华（33）

周恩来同志抗战初期在武汉……吴光耀（60）

抗战初期党对武汉文艺运动的领导

……邵和平（80）

武汉会战纪略……华　泽（94）

威震武汉

——记汉阳抗日第一仗……李人林（111）

血沃中华　名垂青史

——抗日英烈　张自忠……张笃勤（118）

日本侵略军在武汉沦陷时期的经济政策

……马舍乡（128）

汪伪在武汉的特务组织……张孟青（139）

从汉奸群相看武汉伪政权……秦特征（153）

抗战时期武汉大事简记

……张广立　皮明麻　龚樟有（162）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序

余金堂

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失败以后，中华民族备受帝国主义欺凌；接着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庚子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均以割地赔款而告终，国家被沦为半殖民地，人民被视为"东亚病夫"。更为甚者，"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吞并满蒙，进军华北，叫嚣灭亡中国，妄图要中国人民当亡国奴！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中国守军奋起抗战，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和推动下，实现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发动了全民族的抗日战争。全国军民爱民族，爱祖国，同仇敌忾，经过八年的流血牺牲，终于迫使日本侵略者无条件投降，取得了抗击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胜利。这一伟大胜利，标志着炎黄子孙永远不会当亡国奴，标志着中华民族从百年屈辱中挺立崛起，跻身于世界独立自由国家之林。联合国组成时，中国成为拥有否决权的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

在抗日战争初期的一九三八年，平、津、沪、宁相继失守之后，国民政府机关、军事委员会和中共中央代表团、八路军办事处都迁来武汉，武汉已成为当时全国抗战的实际首都和指挥中心。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全国爱国民主人士云集，群众运动如火如荼，前方战场前扑后继，英勇杀敌，到处显现着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当日本侵略军从六月中旬由安庆沿长江两岸分五路

向武汉进攻时，武汉保卫战即在皖、赣、豫、鄂四省数千里战线上展开。这一会战，历时四个半月，予侵略者以重大消耗，粉碎了日军"速战速决"的迷梦，迫使它陷入长期作战的泥潭。

十月二十五日武汉撤守后，全市人民从此处于日寇铁蹄和汉奸败类双重蹂躏之下，达七年之久。在此期间，我新四军和抗日游击队，控制武汉外围，经常沉重打击敌人；市内的许多爱国志士和地下抗日工作者，不顾杀身丧家之祸，秘密与外围抗日武装相呼应。在我军民的英勇斗争和打击下，迫使日寇和汉奸龟缩市内，坐卧不安，惶惶不可终日。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我们缅怀抗战殉国的先烈，赞颂当年爱国同胞的艰苦业绩，必须记取这一伟大的抗日战争史实。作为武汉人民，必须永志武汉在抗战中的光辉一页。为此，武汉市政协文史委员会、武汉市社会科学联合会和武汉市历史学会联合编辑出版《抗战中的武汉》一书，具体、翔实地记录和歌颂了武汉人民在保卫武汉时和沦陷后所作的贡献和牺牲；也把那些认贼作父的汉奸败类钉在耻辱柱上。

抗战胜利，是全中国爱国人民流血牺牲、艰苦奋斗的结果，也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成果。《抗战中的武汉》所记录的史实，向我们作了具体而又生动的介绍，她启发我们要永远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团结一切爱国力量，为早日实现祖国的四个现代化而奋斗。她启发我们促进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完成祖国的统一大业，是完全必要的和可能的。

（余金堂同志曾任武汉师范学院院长，现任武汉市政协副主席、武汉市历史学会名誉理事长）

武汉抗战概述

皮明庥

国民政府机关西迁武汉的抗战部署　中国共产党在武汉抗日救亡斗争　抗日救亡文化运动在武汉的高涨　武汉会战　新四军五师对武汉的战略包围

郭沫若在《洪波曲》中说："武汉三镇，自北伐以来，在刀光血影之下，已经窒息了整整十年"。在抗战初期，沉睡了十年的武汉，"似乎又在渐渐地恢复它在北伐时代的气息了"。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芦沟桥事变，全面发动侵华战争。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中国国内的阶级矛盾降低到次要地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进行了持续八年的艰苦抗战。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政府和军队，在西安事变后，逐步实行了政策转变，明确了抗日立场，在正面战场进行抗战，但始终存在妥协的倾向，并且一次又一次发动反共高潮。在抗战中开始后不久的一九三七年底，武汉成为全国抗战的中心。

一，国民政府机关西迁武汉的抗战部署

日军挫败"八·一三"抗战，占领上海后，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三日占领南京，制造了灭绝人性的南京大屠杀。十一月二十日，国民党政府宣布迁都重庆，政府机关先迁到武汉，武汉成

为国民政府的临时陪都。当时，日蒋矛盾日益加深，受英美支持的蒋介石也把工作转移到抗战轨道上来，国民政府抗日态度也趋向积极。蒋介石来到武汉，并在武汉大学（时该校已迁往四川乐山）举办了军官训练团。但这时，汪精卫已谋求与日本妥协，蒋介石也作过妥协的试探，并企图通过德国的斡旋而乞和，但没有成功。在节节进逼的日寇面前，经历了“西安事变”后的蒋介石采取了抗战的决策。

作为抗战的一种表示，蒋介石处决和处分了一些畏敌如虎的败将。

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一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在开封召开第一、五战区团以上军官会议，蒋介石斥责部分高级将领为保存实力、望风退却，并也令将在津浦线上后撤、放弃山东重镇济宁的山东省政府主席、第三集团总司令、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陆军上将韩复榘拿办。当时，蒋介石因南京失陷退到武汉，准备入川。韩复榘与四川军阀刘湘勾结，密谋由刘湘封锁入川之路，韩复榘则从南阳、襄樊、汉中撤退，与宋哲元部联合倒蒋。蒋察觉这一阴谋，蒋在开封以召集军官会议为名，决定捕韩，押解武汉。一月十九日，武汉行营宣布韩的罪状为不遵长官命令、擅自撤退、强迫鲁西人民购买鸦片、强索民捐、侵吞公款、搜缴民枪。一月二十四日，判处死刑，即行枪决。①

差不多同时，一九三八年一月，国民党政府和军事委员会在武汉公布了四十三个抗战不力将领判决名单，其中判死刑八人，其它处分三十五人。主要有：第九集团军副总司令香翰屏，因指挥失当，记大过一次；六十一军军长李服膺，贻误战机，放弃守土，处死刑；第三十九军军长刘和鼎作战不力，解职留任。

蒋介石这些严厉措施，既是国民党正面战场溃败的反映，

①《新华日报》1938年1月25日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体现了国民党政府初期的抗战姿态，也暴露了蒋介石集团内部矛盾，达到了蒋介石消除异己的目的。

紧接着，为了确立抗战的政略和战略，国民党举行了临时全国代表大会。

国民党原定在一九三七年十月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全面抗战爆发后，为应付抗战局面，决定举行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九日至四月一日，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昌举行，蒋介石、汪精卫、于右任、李宗仁、冯玉祥、陈果夫、孔祥熙、等十七人组成大会主席团，出席和列席者三百五十三人。

在大会召开之前，中国共产党先后发出了《中共中央对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的提议》和其它电文，要求国民党召集国民大会，通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共同领导，吸收各党派爱国人士参加政府。

这次大会确定蒋介石为国民党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并决定设立三民主义青年团。

大会的主要任务是制定《抗战建国纲领》，并发表了《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在"纲领"中，确定抗战与建国，并举的方针。"纲领"包括了外交、军事、政治、经济、民众运动、教育等六方面的政纲：外交方面提出"制止日本侵略，树立并保障东亚之永久和平"；军事方面规定"加紧军队之政治训练"和训练全国壮丁，充实民众武力，补充抗战部队"；政治方面表示"组织国民参政机关"，"加强完成地方自治条件"；经济方面提出"奖励海外人民投资，扩大战时生产"和"以全力发展农村经济，奖励合作"等；在民众运动方面表示"发动全国民众"，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以及保障言论出版自由等等。

在"宣言"中，指出"此次抗战，为国家民族存亡所系，人

人皆当献其生命，以争取国家民族之生命”。号召“组织民众，训练民众”。但同时又强调全国抗日力量在国民党、蒋介石领导下，实行“政治的统一”，要各党派作“政治的休战”。

抗战建国纲领是国民党抗战初期的全面政治纲领，标志着国民党在“七·七”事变后政治上的进步和政策上的转变，对当时抗战形势表现了适应性，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这种进步是有限度的，“纲领”中没有提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反对妥协的主张，也没有提出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组织有抗日党派参加的政府、释放政治犯等。至于允许集会结社等许诺，也往往是一纸空文。因此，这个纲领，实质是国民党片面抗战路线的纲领，与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有重大的区别。但为了共赴国难，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在抗战初期的进步表示积极欢迎。

在大会之后，一九三八年四月，国民党政府公布了《国民参政会条例》，决定设立国民参政会，规定在抗战期间，政府对于重大对外重要方政方针，应提交参政会决议。七月五日，毛泽东、董必武、秦邦宪、吴玉章、林伯渠、邓颖超、陈绍禹等七名共产党参政员发表了《我们对国民参政会的意见》，提出动员各方面力量保卫大武汉；改革征兵制度，改善人民生活，普遍发动群众，保障人民权利，七月七日，毛泽东致电参政会，提出：“一曰，坚持抗战；二曰，坚持统一战线；三曰，坚持持久战”。

一九三八年七月六日，国民参政会首次会议在武汉举行。会议十天，出席的有各党派、各团体代表一百三十六人，还有政府各院部官员、来宾、中外记者一千人列席会议。议长汪精卫致开幕词。蒋介石在会上讲话。大会收到一百二十五件提案。中共代表和各党派、各群众团体代表，提出了许多重要建议，诸如“正式确定抗日各党派之合法地位”、“严令禁止各党部及各级政府

压抑民众救亡运动"、"根本改革现行保甲制度"、"明令减除苛捐杂税，减少高额地租，取消高利贷"等，但受到国民党顽固派的阻挠，而汪精卫派的参政员则提出"加强德意外交"等反动提案。会上，内政部长何键、外交部长王宠惠、财政部长孔祥熙、教育部长陈立夫、交通部长张嘉璈、经济部长翁文灏、政治部长陈诚分别作了工作报告。

会议最后通过了《拥护国民政府实施抗战建国纲领案》、《拥护政府长期抗战国策案》、《改善各级行政机构案》、《切实保障人民权利案》等。会议在"宣言"中号召各党派"舍小异而趋大同"，"动员一切物力人力，为自卫而长期抗战"。会议决定在参政会闭会期间，设驻会委员会，并选出张君劢、左舜生、沈钧儒、董必武、陈绍禹、秦邦宪等二十五人为驻会委员。

参政会成立于抗日气氛高炽之时，体现了包括国民党在内的全国各阶级、各阶层、各党派的抗日立场，也表现了国民党政府在抗战初期一定程度地开放了民主。在武汉举行的首次参政会，尽管政见纷陈，但抗日救亡的方向成为会议主流。不过，国民党政府对会议上的决议，此后并没有真正实施，待武汉失守后，国民党积极反共、消极抗战，参政会也就堕落成国民党的骗人工具。

二，中国共产党在武汉的抗日救亡斗争

在国共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的政治形势下，中共湘鄂赣省委和坚持在鄂豫皖地区的红军都遵照党中央指示，同国民党进行第二次国共合作谈判。中共中央代表董必武于一九三七年九月由延安抵武汉（住汉口安仁里一号），参加了谈判工作，并筹组八路军驻汉办事处，营救被国民党关押的同志，指导重建在湖北、武汉地区组织，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十月，在汉口安仁里二号成

立了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办事处处长李涛。十二月，南京梅园新村的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人员分批撤入武汉，并入武汉“八办”。一九三八年元旦，“八办”迁入旧日租界中街八十九号原大石洋行办公（现长春街六十七号），由钱之光任处长，下设副官、总务、文书、会计、运输、警卫、机要、招待所等部门。原在南京的八路军代表叶剑英以及李克农、廖承志等负责同志亦到达武汉。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确定成立中共长江中央局。当月中旬，中央代表周恩来、秦邦宪、陈绍禹（王明）等抵汉，在“八办”内设立长江局机关，对外一律以“八办”名义进行工作。长江局由陈绍禹任书记，周恩来任副书记兼统战、军事部长，委员有董必武（群工部长）、凯丰（宣传部长）、李克农（秘书长）、叶剑英、项英（兼东南分局书记）。长江局的任务是指导南方和大后方各省党的工作，还代表中共中央向国民党及其它党派进行统战工作。同月，新四军成立，叶挺任军长，项英任政委。为了扩大抗日武装和根据地，红二十八军改编为工农抗日联军挺进司令部，改编时掀起扩军高潮，吸收二千多人入伍。长江两岸游击队组成新四军第四支队。

在“八办”附近的大和街，设有新四军驻汉办事处和招待所，项英、叶挺均在此办过公。一九三八年元月下旬，在南昌成立新四军军部，该办事处工作由“八办”代为办理。

“八办”是我党在国统区领导抗日斗争的领导机构，在这里实施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全面抗战的路线。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同志广泛地在军界、政界、文化界和工人、学生中做了大量工作。“八办”的公开工作是每月向国民党政府领取八路军军饷、军械、被服等，经火车运往西安“八办”，再转运山西八路军总部和延安。同时收转国际友好人士、华侨捐献给八路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军和解放区的款项，接待各党各派各团体人士及进步青年以及国际友人、爱国华侨，帮助他们到延安、山西、竹沟、七里坪、汤池、皖南等地参加八路军、新四军工作。在“八办”的接待室，周恩来等同志会见过许多来访的青年学生和工农群众，许多同志就是在这里转介到延安抗大、陕北公学和革命根据地的。仅一九三八年五——八月，通过“八办”输送到延安的青年即达八百多人。

“八办”为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民党军、政界及各党派、各团体和广大工农青年学生进行联络，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发动群众，团结抗日，对国民党在抗战初期表现出来的抗日积极性给予支持，对其妥协倾向进行了有节制的斗争。一九三八年三、四月间，国民党擅自下令解散我党领导下的公开抗日组织——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周恩来同志指示《新华日报》发表社论、文章，强烈抗议。有一次，蒋介石邀请周恩来到珞珈山会谈，周针锋相对地揭露蒋介石妄图取消我党、搞垮我根据地的阴谋，并义正辞严的驳斥蒋，坚持我党在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立场，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在八路军办事处对面的一座楼房安排大批特务监视周恩来等人的行动，周恩来等同志视这些鼠辈如荠草，不顾个人安危，光明正大地发动抗日救亡斗争。

为了制造革命舆论，宣传我党的政治主张，党在汉口创办了《新华日报》（1938.1.11——1938.11.25）和《群众》周刊。周恩来十分重视报刊工作，抓政治，抓思想，经常给报社出题目，看文稿，改文章，还亲自写社论、专论。根据党中央关于“长江局的中心任务是武装民众，准备发动游击战争，有计划地建立几个游击队和游击区”的指示，周恩来、董必武等同志和湖北省委还部署举办了河南鸡公山干部训练班、湖北应城汤池合作事业训练班。陶铸同志（时任湖北省委委员、宣传部长）则亲自

负责汤池训练班的工作，与民主人士李范一合作，先后培训了四百多人，为革命根据地和新四军五师培养了一大批骨干。

“八办”和董必武同志还大力营救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被国民党政府关押的革命同志。当时“反省院”中党员成立了临时党支部，把党员和积极分子名单暗中送到了“八办”和董必武手中。董必武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间，从湖北反省院营救出任卓民、华岗等六名难友，不久湖北反省院裁撤时又救出一百二十余人。在秘密工作中，不少失掉组织联系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也经过“八办”和董必武同志的联系，恢复了关系。湘、粤、桂、滇、川、赣、皖、苏、浙等省中共组织的负责人，都曾来到武汉“八办”，向长江局请示工作。

当时，苏联和世界各国爱好和平的人民纷纷以各种形式支援中国抗战。苏联派出的军事顾问、苏联的航空志愿队和大批飞行员，先后到达武汉。加拿大著名医生、国际主义者白求恩从国外到达武汉，于一九三八年春到延安。印度孟买学院附属医院大夫柯棣华于一九三八年九月三十日率医疗队到达武汉，后又冲破国民党阻拦，到达延安。斯诺（美国）、斯特朗（美国）、史沫特莱（美国）、路易·艾黎（新西兰）、伊文斯（荷兰）等，都在中共代表和“八办”的接待、介绍下，或从敌后到武汉，或从武汉进入延安和敌后根据地，参加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斯诺在一九三八年春夏与路易·艾黎在武汉成立工业合作促进会，建立战时合作社，组织难民自救，支持游击战争，并在菲律宾及南洋华侨中募集到一百余万元捐款。史沫特莱在武汉“国际慰问团”，带着两卡车药物到山西慰问八路军。

这一个时期，党内斗争也呈现复杂的局面。在长江局中，担任书记的王明推行右倾机会主义。他在武汉大学讲演中，公开认为“国民党的经济力量最雄厚、军事力量最强大”，中共在武汉

的主要工作就是“统一战线”。基于这种认识，王明把抗日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身上，成天忙于会见达官贵人、军政要员，他还提出“抗日的政治中心力量在国民党”、“取消我们的苏维埃”，在行动上则放弃扩大党的抗日武装和放手发动群众，使我党丧失了建立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大好时机。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多次批评了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周恩来在一九三八年七月于武汉群众大会上演讲，逐章逐节讲解了毛泽东的《抗日游击战争中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所阐明的党的路线和主张。当新四军军部成立时，周恩来在武汉向新四军第四支队负责人传达了党中央关于建立敌后根据地的重要指示。一九三八年春，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的张国焘逃到武汉，周恩来根据党中央指示，派童小鹏、邱南章到火车站去找张国焘，进行严正的批评，耐心的争取，给张国焘以最后的挽救。张国涛自绝于革命，一头栽进国民党怀抱。周恩来亲自宣读了党中央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并对不愿跟张国焘逃跑的警卫员给以亲切关怀、鼓励，亲自写条子将这位同志送回延安。在办事处的党小组会上，周恩来以张国焘投敌叛变作为反面教材，组织大家进行讨论，进行了一次生动的党内斗争的教育。

一九三八年秋，日寇对武汉发动进攻，武汉形势告急。国民党的大员纷纷后撤和出逃。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同志处变不惊，临危不惧。这年十月，由文协、三厅、鲁迅纪念委员会联合召开纪念鲁迅逝世二周年会，郭沫若担任主席，潘梓年、冯乃超、胡愈之先后讲话。周恩来发表演说，以“疾风知劲草”来歌颂鲁迅先生的坚毅顽强，号召人民学习鲁迅的战斗精神。十月十七日，周恩来在八路军办事处三楼的住室中伏案疾书：“鲁迅先生之伟大，在于一贯的为真理正义而倔强奋斗，至死不屈，在于从极其艰险困难的处境中，预见与确信有光明的将来。这种伟

大，是我们今日坚持长期抗战，坚持最后胜利所必须发扬的民族精神”。

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五、二十六日，汉口、武昌先后沦陷。在此之前，国民党文武大员早已似鸟兽散。周恩来同志坚持到最后，在撤退前一天，还召集《新华日报》社同志讲话：“国民党已经撤离武汉，蒋介石也走了，但我们共产党人应该冲锋在前，要坚持到最后的时刻才能撤退”。

在抗战军兴时，除建立长江局和“八办”外，中国共产党还加强了武汉地区党组织的工作。

武汉党组织自大革命失败后屡遭敌人摧残，又由于左倾路线的影响，党组织没有得到有秩序的退却，到一九三四年已完全破坏，直至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前，全市没有与党中央联系的统一的正式党组织。

在漫漫长夜中，摸索救国救民真理的武汉革命者们在寻找党，寻找马列主义。一九三七年，荆州沙市地区建立了一个自发的共产党支部，有党员三十多人。这个支部没有与党组织接通关系，负责人又是一个的叛徒（出狱后组织自发支部），但参加自发支部的成员大多数是热血青年，革命志士。不久，何功伟由上海到武汉工作，把这个自发支部接收过来，并在武汉建立临时工作委员会，参加者有一些不纯分子，以后被清洗。以上组织在抗战爆发后，派人到北平、西安、陕北找党接关系。八月，在“一二·九”运动中入党的清华大学学生杨学诚于一九三七年五月参加了延安党代表会议后，又随流亡学生到南京，经博古同意辗转至武汉，接收了何伟领导的二十二名党员及华北流亡学生党员十几人，成立了中共武汉工作委员会，杨学诚任书记。

在武汉工作委员会下，于武汉大学设立了一个中心支部，还有一个学生小组的一个妇女工作党团，以及几个分散活动的党

员，武汉工作委员会除在学生、工人中进行工作外，还开始与军界联系。

九月，中共中央代表董必武到武汉，着手恢复湖北、武汉党组织。同月二十五日，郭述申（化名李振寰）来到武汉，主持湖北建党工作。十月中旬，中共中央南方局派钱瑛、陶铸、（陶剑寒）到武汉，与郭述申组成湖北省工作委员会（受中共中央书记处领导），以郭述申为省工委书记，分管组织与工运，副书记陶铸兼宣传部长（不久由何伟任宣传部长），钱瑛任组织部长。省工委接收、审查了武汉工委，清理原来的自发支部，发现叛徒，清除了十几个人，然后逐个发展，原自发支部的二十多人成为正式党员，杨学诚则参加省工委工作。省工委还接收了汤池训练班、七里坪训练班及群众团体中的一批党员。并成立了工人运动、文化运动、农民运动、妇女运动四个小组，在武汉大学成立了支部；又将学联公开合法化，还组织了青年救国团。不到半年，武汉的工厂、学校建立了一批党支部，武昌郊区成立了中共武昌近郊区委。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中共湖北省工作委员会举行第一次扩大会，决定成立湖北省临时省委。郭述申任书记，钱瑛（组织）、何伟（宣传）、王亦清（工运）、方静吾（方敬，农运）为常委，杨学诚（青运）、陶铸（合作社党团）为委员，连士秀（即马仲凡）、黄敬祥为候补委员。此时，武汉地区共有党员一百多人（本地党员占三分之一，外地流亡学生党员占三分之二），这些党员大部分分布在群众团体之中。临时省委一成立，即着手于到各县去开始工作，不少旧的关系是通过董必武的介绍，经审查后恢复起来的。但因干部缺乏，组织恢复、发展工作进展缓慢，仅在黄冈建立了以刘西尧任书记的县委。

一九三八年三月，临时省委召开第一次扩大，委员增至十一

人。会议决定工作重心放在武汉，并以开展工运为主，同时注意党的发展和外县党组织的建立。同月中旬以后，根据中央大量发展党员的指示，临时省委大力抓了党员发展工作。至五月十九日，武汉党员发展到三百六十六人，全省发展至一千〇四十人。武汉的大工厂中都有十至二十人的支部，有二十多所学校发展了党员。同时，建立了武昌、硚口、汉口三个区委，黄冈、应城、阳新三个县委，鄂西、鄂北两个工委，沔阳、崇阳两个特支，六个省群众团体党团。

五月二十二日，在董必武等同志指导下，召开临时省委第二次扩大会，选举委员十五人，正式成立湖北省委。书记郭述申，委员有郑位三、钱瑛（组织）、何伟（宣传）方静吾、何彬、王瀚（秘书长）、杨学诚、王亦清、姜纪常（统战）、蔡书彬、左觉农等。省委加强了外县组织的发展，建立了鄂东、鄂中、鄂南三个特支和鄂西、鄂北两个中心县委。至此，中断了数年的湖北、武汉党组织，得到了重建和发展。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日统计，全省党员三千二百人以上，其中百分之八十为农民工人①。

由于时局动荡，党的斗争任务时有变动，不少党员调至华北、延安及大后方。徐州失守后，武汉形势紧张，不少工厂、学校内迁，因此党员转至四川、湖南的不少，也有的参加军队或战地服务团，或调陕北，或回乡发动群众。武汉转至外地党员达四百五十人。到武汉沦陷时，全部党员均转至大后方或根据地进行抗日斗争，以后党仅派过个别党员在沦陷后的武汉活动。

三，抗日救亡文化运动在武汉的高涨

抗战初期，民族精神激励着广大爱国文化工作者，大批文学家、理论家、诗人、戏剧家、音乐家、画家、演员、记者、艺人

①参加郭述申《湖北农民运动与组织工作》

以及社会科学家云集武汉。

适应抗日斗争的新形势，为了团结文艺界为抗日战争服务，建立全国性的文艺界抗日统一战线组织已提上了日程。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之下，经过爱国文艺界人士的共同努力，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七日，在汉口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大会召开于汉口商会大礼堂。

大会选出郭沫若，茅盾、夏衍、田汉、巴金、郁达夫、郑振铎、老舍等四十五人为理事并推举周恩来为名誉理事。

作为抗日文艺统一战线组织，文协在"宣言"中明确地树立了自己的宗旨："对国内我们必须喊出民族的危机，宣布暴日的罪行，造成全民族庄严的抗战情绪和生活，以求持久的抵抗，争取最后胜利；对世界我们必须揭露日本侵略者的罪行，引起世界人民的正义感，以共同制裁侵略者"。周恩来同志参加过文协的许多重要活动，号召作家学习鲁迅革命精神，坚持"韧性"战斗，帮助许多文艺工作者走向了革命道路。

文协成立后，开展了抗日救亡文艺活动：

首先是建立全国作家通讯网，出版了《抗战文艺》作为会刊。同时推动成都、昆明、延安、上海、桂林、广州、贵阳、香港等宣传抗日，反对投降以及反映人民生活的作品。

其次，在"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下，鼓励作家走出狭隘的知识分子圈，深入到战地农村去宣传抗日，直接为抗战服务。武汉沦陷后，文协迁入重庆，就组织了作家战地访问团，抗战文艺工作团赴西北、中原战场，出版了《作家战地访问团丛书》等。

再次，提倡文艺大众化、通俗化，开展通俗文艺。同时举办纪念会、座谈会、讲座等，进行抗日文艺宣传。在战争和民族危亡刺激之下，报告文学盛极一时。著名作家老舍为在街头自拉自唱

的河南艺人写抗日唱词，冯乃超请几位画家画了宣传画，在武汉街头象拉洋片那样进行宣传。

在抗日救亡宣传中，郭沫若主持的三厅起了重要作用。当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成立政治部，以陈诚为政治部长，周恩来，黄琪翔为副部长。下面分三个厅，第一、二厅全为国民党所控制。蒋介石、陈诚的原意是以文化界知名人士郭沫若任挂名厅长，另派其亲信刘健群任副厅长掌握实权。中国共产党和周恩来同志坚决反对国民党把持之厅，力争三厅成为体现党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文化宣传领导机构。在几个月的磋商和斗争中，三厅难产。一九三八年四月一日，三厅在武汉正式成立。郭沫若任厅长，范寿康、阳翰笙任副厅长，主任秘书阳翰笙，秘书付抱石、钱瑞铮。三厅下设第五、六、七共三处，每处设三个科。第五处处长胡愈之，管一般宣传；第六处处长田汉，主管艺术宣传；第七处处长范寿康，主管对敌宣传和国际宣传。全厅编制定员三百多人，办公机关设在武昌昙华林（现十四中内）。

为了直接进行抗敌宣传，三厅还附属有四个抗敌宣传队、十个抗敌演剧队、一个孩子剧团、一个新安旅社团、一个漫画宣传队，除此外，还有电影制片厂以及五个电影放映队，总计在三千五百人左右。

四月七日至十三日，三厅举行了抗战扩大宣传周。四月七日上午，周恩来、郭沫若等出席了在市商会大礼堂举行的宣传周开幕典礼。在七天的宣传周中，每天都有一个宣传重点。四月七日为文字宣传日，这时恰好传来了台儿庄我军大捷消息，三厅即日举行庆祝大会，当晚举行火炬游行，郭沫若等走在十万游行队伍的前列。四月八日为口头宣传日，三厅组织数以百计的群众团体在大小巷进行演讲。四月九日为歌咏宣传日，各机关、学校、工厂、团体成立的歌咏团，聚集在汉口中山公园体育广场，由著名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